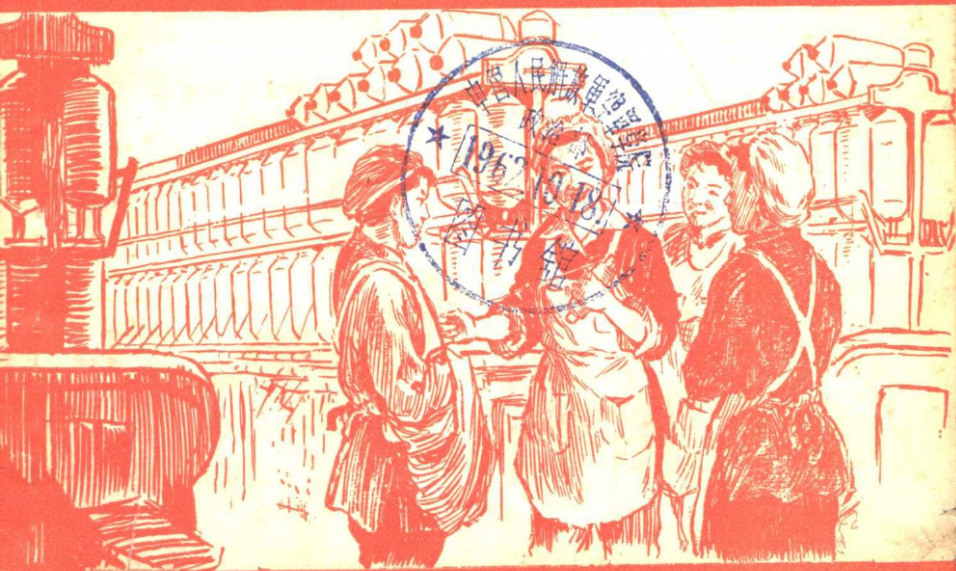


永远向前的黄宝妹

YONGYUAN XIANGQIAN DE HUANG BAOMEI

“快馬前進的青年工人”之八

BBK 44/10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里，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黃寶妹的先進事跡。黃寶妹在解放後接受了黨的教育，成長為一個先進的工人，成為工人的一面旗幟。這本書就是寫她虛心學習、不斷前進的故事。

黃寶妹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永遠向前的黃寶妹

“快馬前進的青年工人”之八

唐克新著 朱 然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文6035 (高)

開本787×1092 耗1/32 印張13/16 字數16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R10024·2047

定價：(3) 0.07 元

編者的話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到十二日，五百多個青年工人 在上海舉行了全國青年工人代表會議，他們代表全國七百萬青年工人，向祖國匯報了生產大躍進的成績。

這五百多位代表，有的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的來自廣西僮族自治區，有的來自浩翰天邊的大興安嶺，有的來自荒無人煙的戈壁灘，有的來自波濤洶湧炎熱的南方港口，有的來自拔海五六千公尺的大雪山……他們都是祖國的優秀兒女，都是社會主義的英雄好漢。他們在大会上立下英雄豪邁的誓願：要繼承中國工人階級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要做社會主義建設的急先鋒，要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他們要比干劲，比鉅勁，學本領，趕先進，創奇蹟，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青年工人這種英雄氣概和革命熱情，是值得我們少年兒童們學習的。

為了讓少年兒童學習青年工人的優秀品質，我們組織了一些作家、記者寫稿，出版了“快馬前進的青年工人”叢書。由於時間、人力有限，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代表的優秀事蹟都介紹給大家，這裡介紹了一位勞動模範黃寶妹的事蹟。我們相信：從這本書的故事中，讀者將受到不少教育。

这是个晴朗的初春的早晨，太阳还没露脸儿，黄浦江还籠罩在乳白色的晨雾里；巍峨的大厦远远望去都成了一些青灰色的影子。那一陣陣清凉的晨风迎面扑来，使人为之欲醉。一个多迷人的春之晨啊！

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我坐上电車，去到那烟囱林立、烟雾弥漫的楊树浦訪問黄宝妹。

电車迎着浦江的晨风向前飞奔着，我的心也跟着車子的顛簸而跳蕩着。

她，今年才26岁，可是她的青春，在建設偉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已經发出了灿烂的光芒。从祖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第一天起，她就月月全面超額地完成国家計劃，在这五年多的時間里，不論国家計劃怎样修改提高，也不論生产怎样变化，她总是駕馭着自己的駿馬，一馬当先地飞奔在国家計劃的前面，一切困难都被她征服了。于是不久，在她的后面，万馬奔騰起来了：浦玉珍、俞桂珍、張小妹……都相繼地跟上来了，有的还一下子冲到她前面去了。可是她还是不停歇地前进着，前进着……現在，在她脱离生产崗位将近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車間，駕上自己的駿馬，两年的时间，她仅仅用一个多月，就赶上了，于是，她又象一个火車头似的奔在前面，

帶動着全廠的姊妹，以及許多別的廠的姊妹們勇猛地向前突進着……

我來到廠里已經是六點半了。昨天工會里的同志替我約好，在今天早晨她夜班放工後碰頭。夜班是六點放工，但現在她却還沒來。我只得坐下來等她。又是半個鐘頭過去了，可是她還沒有來，我有些焦急了。

“她會不會回家了？”

“不，決不會的。”工會的那位同志有把握地說，“她平時做夜班，總是要到九點多鐘才出來呢。現在大概又給誰拉住了，我們還是進車間去看看吧。”

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我們進了車間一間，夜班的人早都跑了，至於她呢，都說還沒走，就是不知道哪里去了，每個人的回答都是：

“她剛剛還在這里的，現在……”

我們只得又挨着一條條的車弄堂找過去，足足找了十來分鐘，才在一條車弄里找到了她。她穿着一身洗得已有點發白的藍制服，戴着一只雪白的口罩，兩顆烏黑的眼珠顯得分外活潑明亮。一眼看上去，你就會知道這是個聰明、能干而滿充青春的活力的人。

當工會那位同志把她從車弄里叫出來，還來不及介紹時，她就大方地向我伸過手來，帶着歉意地笑着說：“叫你等了不少辰光吧？”

“沒關係，你是很忙的。”我說。

“这几天我們正在为全班八天消灭接头白点而努力呢。”

她的話剛說完，就有两个女工来找她了：

“你再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看样子，那两个女工非要拉她去一下不可，她为难地对我笑了笑，我只好說：“你去吧，我等会没关系。”

这天，直到八点多鐘她才出車間。为了避免不断来找她的人的打扰，我們決定到她家里去。

她家的住房是一座构造十分简单的矮平房，里面的陈設非常简单：前面一間放着一張旧“八仙桌”和几只竹椅；后面一間放着一張半旧的書桌和一只脫了漆的木床和衣厨。唯有四面牆上最熱鬧：挂滿着各色各样的奖状和她自己的劳动模范照片。她的媽媽——一位六十来岁、头发灰白、身体壮健的老太太，热情地招待了我們。

“談些什么呢？真的沒啥好談的……”大家坐下后，她有些拘束地笑着說。

我指着牆上的那許多奖状和照片說：“你看，这么多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沒有啥好談呢。”

她的母亲是一位风趣的老人，这时忽然插上来说：

“你們老是来訪問她，可是她却連一頓飯也做不来，不信，你們可以問問她。”

“真的……”女儿笑着承認道。

“可是她在生产上是能手呢！你真养了个好女儿。”我接上去說。

“是啊，我这孩子 12 岁就做厂，什么苦头都吃过，可就是没有学会做饭。”老太太有些感慨地说：“可是她能得到今天这么多的光荣，还不全是党的培养呀！我们也在旧社会里做了一辈子工，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们的运气比我们好……”

是的，生长在我們这个时代的青年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通過劳动去实现自己一切的理想和得到一切荣誉，但是，这一切却决不会白白給一个对自己的事业沒有热情同时意志也不坚强的人。这里，还是讓我們来听黃宝妹同志說說她的故事吧。

黃宝妹今年虽然才 26 岁，上海解放那年她还不过十八岁，可是旧社会的苦她并沒比她年紀更大一些的人少吃。

宝妹的爸媽原来都是紡織厂的工人，可是在旧社会里，工人的飯碗是朝不保夕的。在宝妹还不大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因为生病而被一家英国紗厂“解散”了出来。那时，母亲在浦东乡下种着人家的三、四亩田（他們一家都不是本地人），宝妹十来岁就跟着父亲一起卖盐做小生意。虽然这样，一家五口（宝妹姊妹三人）还是无法生活，母亲經常背着人流泪。艰难的日子把小小的宝妹訓練得很早就懂事了。为了減輕一些父母肩上的担子，12 岁这一年，她就瞒着父亲和母亲，跟着一位比自己大三、四岁的小姊妹渡过黃浦江，来到一家叫“公大”的日本紗厂（即今天的上海国棉 17 厂）考童工，可是当她排在一群小姑娘的队里时，人家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她。因为她比

这里最矮的人还要矮一头呢。当她走到那考工的日本人面前时，那个日本人瞪着眼問她：

“小姑娘，你的做什么？”

“我来做生活。”宝妹一本正經装着一付大人的样子說。

日本人听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的回去吃点奶奶再来。”

日本人說完，把宝妹的考工条子往地上一丢，就又招換別人去了。

宝妹拾起地上那张条子，一声不响地又去排到队伍的后面。

“小姑娘，你哪能又来咯？”那日本人第二次接到她手里的条子时，奇怪的說。

“我要做生活。”她說。

“你的小小的不行。”日本人做着手势說。

“我行……”

可是無論怎么說，日本人再不理她了。怎么办呢？回去嗎？叫媽媽怎么养活我們？眼看那一长队的小姑娘都快走完了。等到考完，日本人就会把鉄門一关，这时，就再也没有办法了！于是，她一轉身就又排到人家的后面去了。当那个考工的日本人第三次見到她时，只得无可奈何地在她那张考工条子上签了字。因为無論如何，这种廉价的劳动力总是不会吃亏的。

就这样，宝妹进了工厂。

那个时候，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对世事毕竟还懂得太少。

第一天上工，她是多么高兴呀？因为从今后，自己再也不要爸妈养活了，将来生活学好了，还可以养活爸爸。可是一进厂，她这个天真的“理想”就被打破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还要忍受日本领班和“那摩温”的打骂。在学习拌头的时候，稍一不对头，“那摩温”就用筒管的铁头子拷手指头，拷一记指甲里就是一个紫血印。晚上睡在被窝里，她悄悄地哭着，可是在爸妈面前，她还装着愉快的样子说：“啊，工厂里很好，‘那摩温’也很照顾我……”如果妈妈知道她在工厂里受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放她去的。但是妈妈也是做过厂的，她慢慢地从女儿的身上和日常的神情上毕竟看得出一些，因此几次要给“那摩温”送礼去，可是宝妹怎么也不肯。没钱倒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她宁肯饿死也不肯去嘻皮笑脸地去拍人家的马屁，低头哈腰地去向人家讨好。后来，她慢慢地大一点了，懂的事也就更多了。可是“那摩温”还是要骂要打，于是她就和几个小姊妹联合起来对付“那摩温”，这样“那摩温”果然不大敢随便骂她们了，可是却用给她派坏车、坏生活来报复，这样一来，她们不但工资小了，而且还常常要给领班“吃排头”。那些小姊妹眼见还是斗不过“那摩温”，一个个都“跳厂”走了，最后只留下了宝妹一个人。

“宝妹啊，你在人家的手下吃饭，哪能斗得过人家，还是向人家去打个招呼吧。”

有一次，妈妈向人家借钱买来一只母鸡，要宝妹给“那摩温”送去，可是她说：“我宁可把鸡丢进粪缸也不送去！”以后，

“那摩温”每天给她派“烂弄堂”(即生活难做断头多的車),她总是闷头硬挺着做,虽然把她每天累得一到家就躺倒鋪上不想起来,却从来也不肯向别人說声“吃不消”。为了不向“那摩温”屈服,为了使“那摩温”找不到自己一点“差头”(錯处),她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来加快自己的动作和掌握好那条“烂弄堂”,这样,她的技术倒是被“锻炼”出来了,“那摩温”也真奈何不得她。

生活就这样把她锻炼成了一个倔强的姑娘。虽然,那时在政治上她还是无知的。

上海解放的那一年,宝妹才十八岁,那时,她也和千千万万的工人一样,用欢乐的歌唱来迎接了自由和解放。但是她还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知道共产党究竟是什么。

有一次管理員給大家派車,派到一条“单面弄堂”时,誰也不愿意做,因为“单面弄堂”不但要多走路,而且生活也难做。这时管理員只好来找宝妹了。

“宝妹,那条弄堂还是你去做吧。”

“为什么?别人都不肯做,我是好户头么?”宝妹不服地說。她心想:現在誰也不可欺侮人,都有自由了。你們还要这样来欺侮人,我可不答应了。因此管理員怎么說她也不答应。最后,管理員只得去把那位軍管会的指导員叫来。

“你去做吧,黄宝妹同志。”指导員温和地对她說。

“我不去……”

“你怎么可以不听从行政指挥呢？”指导员皱皱眉头說。

“过去‘烂弄堂’总是派給我，现在还要这样，我不去……现在啥人也不可以强迫啥人了。”她理直气壮的說。

指导员知道她誤会了，便对她說：“我們考虑你的技术比較好些，所以請你去做，你一定不肯去那也沒有办法，不过現在的行政可与过去‘那摩温’不同……”

宝妹听完指导员这話，觉得現在的行政确实不象以前“那摩温”那样，心中的气也就消了，最后，她还是答应去了。这天，指导员还給她講了許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道理，并告訴她：过去工人和工厂是什么关系，现在又是什么关系，过去工人做工是为了誰，今天又是为了誰……这些道理对于宝妹來說虽然都是新鮮的，但是从这些談話里，她确实感到自己受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尊重，这以后，对于行政派給她的工作，她每次都是愉快地接受。别人不愿做的“弄堂”，她总是一声不响地去做。

1951年春天，工厂里进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那摩温”制度，不久政府又頒布了劳动保險条例。騎在工人头上的那些工头恶霸、特务狗腿子一个个地被打倒了，工人們个个憤怒地控訴着旧社会、旧制度的罪恶，这一切，对宝妹是多么大的教育呀？可是在她的心里却有个結解不开来，使她的心里日夜斗争着。解放前，为了反对“那摩温”的压迫，她們一群小姊妹，曾經湊合了十个人，拜了个“十姊妹”。这究竟算是什么“組織”呢？后来她鼓足了勇气去找車間支部書記談了。这次，支部書

記不但沒把她当外人，还亲切的和她說了許多道理。告訴她這是一种封建的組織，依靠这种办法是推翻不了反动派的統治的，非要全体劳动人民組織起来不可，……这回，宝妹激动得流出泪来了，她第一次感受到党的温暖，母亲般的温暖！于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她的脑子里树立起来：党，是我們自己



的党；工厂，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这种信念使她对自己的工作和工厂更加热爱起来，她的个性，也一天天更活泼、开朗起来了。

1952年的春天，宝妹入了团，在这一年的冬季，她又入了党。这一年，可以说是她年轻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从一些党课和团课中，她认识了祖国的未来。可是她多么着急啊！她觉得自己是个平凡的人，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呢？

就在这一年，厂里进行了生产改革运动，并开始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扩大看錠看台，准备进行三班八小时生产制。

那时宝妹一个人看着四百枚錠子（这是当时最高的看錠数量），可是，听说郝建秀却能看八百錠到一千錠。她想：如果每个人都能看到八百錠的话，那么每个人的生产效力不是就可以提高一倍了吗？这样，开三班的人不是就足够了吗？因此还没等领导上正式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宝妹就和她两隔壁的两位小姊妹一起自动的试验起扩大看錠来了。

起先，她们三个人合看着一千二百錠，后来又改为两个人看一千两百錠。这时，车间里有些思想较保守的女工们就纷纷地嚷开了：

“这些小毛丫头，谁要你们这样做的？真是吃饱饭没事做，想出花样来害人！”

“她们仗着年轻身体好，我们是吃不消！”

“她们搞出来的花样，让她们自己去做好了……”

大家这一嚷，可把她們几个人吓坏了。她們真以为是闖了禍了。三个人連忙商量：

“人家意見大得不得了，我們不做了吧！”

“是呀，領導又沒要我們这样做……”

可是，第二天領導上就來找她們談話了。

“你們这样做非常对，对国家有好处，應該坚持下去。”

“可是大家意見多得不得了呢！”

“可是意見也有对的和錯的呀。做下去，領導上支持你們！”

三人相对看了一眼，都笑了。后来，行政又給她們添了三个人，把她們六个人組成了一个組，进行重点試驗。不久，她們就每个人开始看到八百錠了。就这样，一个全面扩大看錠的运动不久就在全厂开展起来了。

看錠是增加了，可是皮鞭花也增加了。在全厂中宝妹的皮鞭花虽然是最少的，可是每天也有四十两左右，最多的人一天甚至出到六十几两，每天下班时，每个人总是抱着塞得鼓鼓的一大袋白花去磅。宝妹看着这些雪白的回花，真比挖了自己身上的肉还心痛！她决心要想办法来减少皮鞭花！

那时，郝建秀工作法正开始推广，宝妹也和大家一起学习着。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位推广工作法的小先生对別人都盯得很紧，一到宝妹車上就总是随随便便的，却从来也沒有給她指出过什么缺点。宝妹每跑完一个巡回就問她：“怎么样？”

“不怎么样。”

“給我指出些缺点吧。”

“蛮好蛮好。”

每次的对话总是这样。这使宝妹心里有些不自在起来。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呢？难道她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吗？不会。因为她们两人既不在一个班，过去也不相识。宝妹想来想去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宝妹的名字和照相经常出现在厂的“光荣榜”上，并且还曾受过市团组织的表扬，因此她不好意思指点自己。宝妹决心要解除这位小先生对自己的顾虑。有一次换一只粗纱，宝妹故意把木锭子拿下来换（按照工作法做，是不应该拿下来换的），等一个巡回跑完，兜到车头上，宝妹又问那小先生：

“怎么样？”

“蛮好蛮好。”那小先生照例这样回答。

“你为啥不肯指出我的缺点呢？”宝妹直率的說。

“也看不出什么缺点。”小先生含糊地说。

宝妹本是个直性子人，这时她再也忍不住了，便对那小先生说：“我知道，你是不好意思指出我的缺点，我刚才换一只粗纱就違反了工作法，可是你还說‘蛮好’。”

經宝妹这一說，小先生臉忽的紅了起来，連忙不好意思地說：“也就是那一点点……”

“不只那一点点——我是来向你学习的，你可不能保守呀。”說完，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这以后，小先生果真就对她認真起来了。

那时，已經实行三班八小时工作制了，工人的劳动時間由十小时减少到八小时，可是她每天却有十二个小时都在工厂里。她觉得，要大大的减少皮鞣花光靠現成的工作法还不够，还得自己多动脑筋。因此，每天上班她总是比別人都早，向交班的擋車工了解車子的每一个情况，学习別人每一点优点，琢磨着怎样充分利用每一秒鐘的时间。就这样，她把自己所看的八百枚紗錠完全“装进了自己的脑子”。在工作时，她不必用时鐘，却可以随时回答你什么時間。当时，有些人看着六百錠还喊吃不消，可是她看着八百錠却还觉得很轻松愉快。慢慢地，她的皮鞣花真的直綫下降了，成績是令人敬佩的，从三、四十两一直下降到八、九两！

宝妹的这个成績，震动了全厂的工人，各个分厂的細紗間女工都紛紛自劬来学习她的經驗，一个学习先进經驗的熱潮又在全厂形成了。

1953年的夏季，工厂里开始評选劳动模范了。这天放工后，支部書記給大家作評模动員报告，坐在宝妹身边的車間記錄員推了下宝妹說：

“宝妹，这次評模你有希望。”

“你拿我开啥玩笑。”宝妹臉也有点紅了。

“真的，你的皮鞣花最少。”

“少出几两皮鞣花有啥了不起！”

怎么說宝妹也不能相信記錄員的話，但記錄員的話毕竟在她心里激起了一陣小小的波浪。过去常听說做了劳动模范

可以上北京，見毛主席，但她覺得自己是个极普通的女工，簡直太平凡了，每天除了管好她那几百枚錠子，別的她有什么成績呢？想到这里，她簡直有些煩惱了。支部書記的報告結束了，她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究竟講了些什么。

但是，她的名字果真在小组里被提出来了，而且很快地通过了車間評委会，送到了厂的評委会……

一天放工时，厂工会主席一把拉住宝妹說：“宝妹啊，我得好好的祝賀你，你被評为劳动模范市里已經通过了，現在材料已送到全国去啦！”

“我——？”宝妹簡直呆住了。

“是啊，你的皮鞦花全国最低，成績已經赶上郝建秀啦！”

宝妹只觉得臉一陣火辣辣的，心猛烈的跳了起来，倒好象做了一件难为情的事情一样，低着头一个劲地往家里奔去……

晚上，她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她想着北京、毛主席，想着火車；（她长到这样大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車呢！）一会，她又煩惱起来：人家是不是会弄錯呢？我的成績在哪里呢，过去她以自己的全部热情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着，只是覺得做了她所起碼應該做的，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荣誉。可是現在，荣誉却在她不知不觉中突然向她拥抱过来了！怎能不使她惊慌呢？可是她的煩惱和惊慌是多余的。真正的荣誉却决不会白白送給一个对人民无所作为的人的。就在半个月后，北京的通知来了：她当选了全国紡織工业劳动模范！通知上并且指定她某月某日去市紡織工会报到、到北京去开